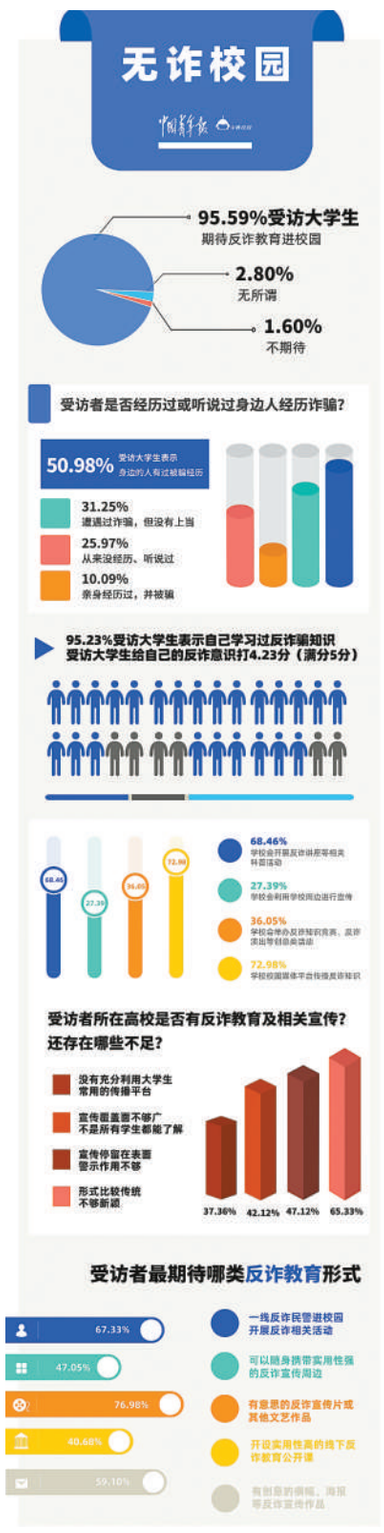
微调查

超九成受访大学生期待反诈教育进校园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毕若旭 罗 希 程 思

姚林林的网店里，出现了一则买家紧急求助：“购买的时候显示账户冻结了9000元，付不了款，怎么回事？”今年春天，姚林林考研上岸，暑期后到就要上海一所知名高校就读。此后，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同学开始向她“求经验”。后来她干脆开了网店，售卖自己的考研笔记。本着顾客的问题都是大问题的理念，她赶紧向买家询问情况，却不想，这句话正是诈骗陷阱的诱饵。

电信诈骗以千变万化的形态出现，造成人民群众财产损失。最高人民法院今年6月发布，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仍居高位，在一些大中城市，此类案件发案量在刑事案件中的占比甚至达到50%。据中国公安部统计，2020年，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2.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6.1万名，打掉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1.1万个，封堵涉诈域名网址160万个，劝阻870万名民众免于被骗，累计挽回损失1876亿元。

大学生等青年群体，是接触电信网络设备技术、产品的主体人群，一些大学生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牵动人心。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106所高校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746份。调查显示有10.09%受访者曾掉进诈骗陷阱，31.25%受访者曾遭遇过诈骗但没有上当，50.98%受访者身边有人有被骗经历，仅25.97%受访者没有经历过、也没有听说过身边人遭遇诈骗。受访大学生对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重视程度较高，95.59%受访者期待反诈教育进校园。

电信网络诈骗“魔爪”向校园蔓延

说起“诈骗”，来自湖南某高校的梁淇有倒不完的苦水。即便已时隔4年，第一次被骗的经历仍让她记忆犹新。“当时我刚上高一，因为是学校是寄宿制，所以家里每个月都会给我打一些零用钱，不过数额也不多。”但令梁淇没想到，刚拿到手的零花钱还没捂热，就被骗子给骗走了。“大概是中午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来自初中同学的消息，她表示自己手机停机了，希望我能帮她充值200元话费，下午就能归还。”收到消息的梁淇有些半信半疑，但骗子很快发来了自己的姓名、学号进行“佐证”。“我表示只能帮忙充值100块，他很快就答应了。”回忆起这段经历，梁淇发现骗子在冒充亲友行骗时，都会提前做一些“功课”，了解一些基本信息，同时表现得非常着急，诱使人赶紧“上钩”。“当他连续发来几条信息表示感谢后，我很快给那个陌生号码充了话费。”

直到初中同学找回账号给自己发来道歉的信息，梁淇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不敢告诉家里人的她只能暂时”节省开支”，“虽然金额不大，但对于当时只是高中生的我来说，打击还是很大的，用网上很流行的那句话形容，就是‘这让本就不富裕的我雪上加霜’。”

谈及“注销校园贷账户”的骗局，来自江西农业大学的闫严表示自己就曾差点“中招儿”。开学之际，他曾接到过一通陌生号码的来电，闫严描述：“对方语气严肃，接通过便直接报出了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还问我是否注册过校园贷。”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是新型骗局的常用套路，一听见对方说起“影响个人征信”，很快便慌了神。闫严回忆，电话那头的不法分子其实说话并不算流畅，反而有些磕磕巴巴，但还是学生的他一听见“身份信息被盗用”“征信”这样影响重大的词汇，慌乱之下很容易被骗子“唬住”。“紧接着他便提出帮我注销账户，但注销操作有时效要求，中途放弃需要时隔14天才能再次办理。”眼见受骗者即将上钩，骗子便会趁热打铁，要求受骗者需在半个小时内将3万元转移到“安全账户”，账号注销后，钱款则会原路退回。“所谓的‘安全账户’其实就是他们的个人账户，我是在借钱的过程中经人提醒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骗局。等我再次质问他的工号及姓名时，他立马就把电话给挂了。”后知后觉的闫严出了一身冷汗，“还好我学费交得早，如果我手头上刚好有3万块，可能就真的被骗走了。”

在公安部刑侦局、国家反诈中心指导下，中国青年报社主办，中国政法大学协办，中青校媒、蚂蚁集团共同承办的“无诈校园——校园防骗计划”启动仪式上，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金安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队指导员陈功名说明了构建“无诈校园”的紧迫性。“电信网络诈骗危害极大，已严重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有的贫困学生为走“致富”捷径借款刷单，最终受骗，金额从几千、几万、几十万元不等；有的学生受骗后无力返还债务，精神压力过大走上轻生道路，付出生命的代价；有的学生走上诈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和电话卡的违法犯罪道路。”陈功名介绍，通过举行形式多样、全校师生参与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可以进一步提高校园反诈意识，自觉抵制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筑牢校园反诈防诈的安全高地，为师生创造更加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

受访大学生期待丰富的校园反诈教育

闫严表示，各种新型骗局在刚出现时，成功率都比较高。“没有听说过、经历过此类骗局，便很难树立起相应的防范意识。”闫严希望大家积极分享诈骗相关的事例、将骗子的常用手段公诸于众的同时，给广大群众敲响警钟。“凡是对方提到‘学生贷款’‘注销校园贷’‘学生账户转成人账户或社会账户’等说辞的，一定就是诈骗。若实在无法判断真伪，可先报警咨询。”闫严希望大家都能接过反诈的接力棒，并将其传递下去。“很多人都以为诈骗离自己很远，殊不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唯有人人都添砖加瓦，这座反诈骗的防火墙才能越筑越高，越筑越牢。”

随着反诈防骗宣传越来越丰富，不少大学生也在关注、学习反诈知识。中青校媒调查显示，95.23%受访者曾学习过反诈骗知识，其中通过媒体的传播、报道学习的受访者最多（84.09%），其次是学校开设的课程、讲座等（81.61%）。此外，公安等相关部门的组织宣传（68.24%）、亲友告知（47.31%）等，也都是受访者的学习渠道。

也曾遇到过电信诈骗的夏岚是福建一所大学的学生，她感叹：“骗子的诈骗手法更新得太快，而且花样越来越多，及时向人们科普新的防骗知识太重要了。”她很愿意去听民警在学校开设的讲座，“反诈民警了解最新的诈骗手段，能把最新的诈骗套路告诉我们，让我们有针对性地防范。而且关于反诈的知识，我们对警察的信任度也更高。当时警官教育我的时候，我就特别反省和自责。”夏岚也很喜欢警察在线上视频平台做的防诈骗传播，“有的民警用段子的形式呈现反诈知识，很吸引人”。

调查显示，受访者接受过的校园反诈教育中，有组织反诈讲座等相关科普活动（72.98%）、学校校园媒体平台传播反诈知识（68.46%）、开设反诈相关课程（56.96%）、举办反诈知识竞赛、反诈文艺演出等创意类活动（36.05%）、利用学校周边（如反诈月饼、反诈水杯等）进行宣传（27.39%）等。

在受访者看来，校园反诈教育还存在一些不足，包括形式比较传统、不够新颖、对学生吸引力低（65.33%），宣传覆盖面不够广（47.12%），反诈宣传停留在表面、对学生的警示作用不够（42.97%），没有充分利用大学生常用的传播平台（37.36%）等。受访者最期待的反诈教育形式，是有意思的反诈宣传片或其他文艺类作品（76.98%），此外，一线民警进校园开展反诈相关活动（67.33%），有创意的横幅、海报等给人视觉冲击力强的反诈宣传作品（59.10%），可以随身携带、实用性强的反诈宣传周边，如水杯、手机壳、帆布袋等（47.05%），开设实用性高的线下反诈教育公共课（40.68%）等，也受到大学生的期待。

有了被骗的教训，梁淇有了更深刻的防范意识。俨然成为好友圈里“反诈小卫士”的她，对电信网络诈骗深恶痛绝：“开学季就是诈骗的高峰期，不少不法分子以打着‘注销校园贷账户’的幌子，诓骗大学生泄露银行卡的信息。”在她看来，此类诈骗对高校学子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失巨大：“我听说我们学院就有同学被骗了一整年的学费，接受了辅导员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疏导。”为此，加入了学院校园媒体的梁淇开始积极参与反诈主题的宣传，主动申报相关选题，并将一些枯燥的知识制作成通俗易懂的图文或视频进行传播。

科技感、花样多的反诈教育吸引眼球

受访者期待的反诈形式中，开发国家反诈中心App这类可以拦截电信诈骗的工具（80.63%）比例最高，打击信息贩卖、杜绝信息泄（72.40%）紧随其后，此外还有做好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等机构的反诈科普工作（66.02%），通过更易于传播的电影、视频、漫画等形式传播反诈知识（59.03%），建立完整有效的诈骗案件举报渠道，公布、还原诈骗过程警醒他人（54.04%），加大对诈骗行为的打击、惩罚力度（52.51%）。建立完整有效的反诈举报渠道，公布、还原诈骗过程警醒他人（51.31%）等。

谈到反诈教育的普及，闫严对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组织开发的‘国家反诈中心App”的推广方式印象深刻。“前段时间，来自河北秦皇岛海港区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陈国平，也就是‘反诈警官老陈’，通过直播连线主播的方式宣传反诈知识，呼吁网友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非常‘出圈’，我个人也觉得非常有意义。”闫严表示自己深刻感受到了公安部门宣传反诈骗的力度，无论是旅游、逛超市、网上冲浪，都能遇到宣传反诈的民警和反诈骗相关的提醒。“有些景区也很会玩，告知游客优惠的前提就是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闫严也特意做了功课，他发现，这款App拥有“来电预警”功能，每当有陌生电话打进来，它就会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比对判断该电话号码是否是诈骗电话，并给出‘疑似诈骗电话’的示警。“不仅如此，它还拥有风险查询等功能，可以查验对方给的支付账户或银行卡号是否存在异常。”

姚林林期待防骗知识更多地出现在大学生常接触的平台，“这些平台还可以针对性地向用户推送一些好的反诈知识传播产品，把好的反诈宣传推到大众视野中。”姚林林也想为校园反诈做一些努力，“比如做一些场景还原的表演、真实案例的宣传等等”。她也在不少App上看到过反诈提醒，在她看来，这也是平台在反诈防骗方面负起了责任，“诈骗，尤其是电信诈骗，也需要这些平台的共同努力”。

在“无诈校园——校园防骗计划”启动仪式上，蚂蚁集团大安全资深总监、反欺诈专项行动负责人顾鸣说：“在全民反诈的浪潮之下，社会各界都在和骗子比拼速度，我们希望人工智能的助力能够成为加速引擎之一。新一代的反欺诈风控体系从静态的被动防守转变为动态的主动对抗，形成了信息泄露防治、异常操作捕捉、风险预警、风险交易阻拦、线下精准打击的全链路防控体系。”

梁淇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可以加入到反诈宣传的队伍中来。“青年可以作为推广反诈教育的主力军，将反诈知识包装成更有意思、更易于传播的物料，在高校乃至全社会进行宣传。”梁淇提到了曾上过热搜的“反诈月饼”，“希望更多高校可以尝试此类创意宣传，易于普及，同学们喜闻乐见。”同时，她期待高校可以组织一支自己的反诈宣传队伍，定期开展主题活动。“比如说举办反诈短视频大赛，或者反诈宣讲等主题活动，甚至可以走出校园，向老人、小孩等易受骗人群普及常见的诈骗手段，打好预防针。”梁淇说道。

苏筱被骗的经历也成了学校老师科普反诈知识的“反面教材”，不过苏筱并不介意，“如果我的经历能给大家起到警示作用，也算值了。”现在，苏筱的手机里多了几道防火墙，国家反诈中心App，以及云南当地推出的小程序“防诈金钟罩”成了她保驾护航的密码。有了一次被骗经历后，“不要贪、不要怕、不要信”成了苏筱常挂在嘴边的“三不”箴言，“遇到可能是诈骗分子的时候，不要害怕，学会拨打110，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财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大学生均为化名）

中青校媒联合上交大媒体与传播学院发起《提高“算法素养”倡议》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罗 希

随着互联网平台的跨越式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加速创新，帮助平台实现精准推送的“算法推荐”逐渐成为互联网企业的“标配”。今年8月，国家网信办起草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一个月，国家网信办再次牵头，九部委针对算法联合制定并发布了《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管理好使用好发展好算法应用，全面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向高校大学生发起《提高“算法素养”倡议》（以下简称《倡议》），鼓励青年掌握算法相关知识、凝聚算法价值共识并进一步形成算法辩证思维，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学生李亦飞是《倡议》的起草者之一，他表示，随着“算法滥用”的蔓延，不断有网民权益被侵害，社会舆论也受到频繁干扰。数据的泄露、不正当的竞争更是会预埋一些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风险隐患。在他看来，公众是算法协同治理体系中必不可缺的一环。

《倡议》中提到，青年作为互联网运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有责任也有义务在提升对算法技术认识的前提下，让算法成为生活、学习、工作中筛选信息的利器、助力净化网络环境及提高网民认知的工具。

“青年作为科技生力军，是最快掌握新兴技术、互联网渗透率最高的人群。希望《倡议》的发起，可以鼓励越来越多的青年为网络环境清朗化贡献自己的力量。”李亦飞说道。

《提高“算法素养”倡议》

各位青年朋友：

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正在不断加速创新,数字经济正在逐渐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当下，“算法推荐”已经逐渐成为一些平台的“标配”，它可以帮助平台实现精准推送。但是，“算法滥用”不仅会干扰社会舆论、侵害网民权益，也会带来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风险隐患。

作为互联网的重要使用者、互联网运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提升对算法技术的认识，让算法成为我们生活、学习、工作中筛选信息的利器、深化认知的助力、净化网络的工具。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向青年朋友们发出如下倡议：

一、掌握算法相关知识。了解熟识各平台的服务功能及特性，主动学习国家对于算法、大数据、信息安全等立法与相关政策，积极参与算法知识普及等活动。

二、凝聚算法价值共识。基于对算法技术与运用规律的正确认知，增强青年相互之间有关算法的共同价值认同。对于违反伦理道德、法律法规的算法进行坚决抵制，避免算法对公共秩序带来危害。

三、形成算法辩证思维。面对“算法推荐”机制，始终坚持辩证思维，对于算法相关的技术热潮保持应有的“冷思考”，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算法。加强自我把关的能力，辨识出低质量、虚假内容，抵制不良信息的传播，不为低俗内容增加流量。

总之，我们要做好科技创新的生力军、网络空间的守卫人，加速提高数字素养和技能，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校宝

田子渝：寻找史料就像寻找宝藏

□ 吴 珊 李 逸

1987年7月31日，一则题为《廿年前高考落榜田子渝，今日里自学成才副教授》的新闻见诸报端。“自学成才的副教授”，就是当时40岁的田子渝。如今，时间又走过了30多年，田子渝已是湖北大学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等。

“科学研究无非就是四个词——兴趣、方向、原则和态度。兴趣是最好的启蒙老师，方向是指路灯和航向标，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吃苦耐劳的态度是科研成功的保障。”田子渝说。科学研究是大学的基本职能，是大学教师的重要任务。从1975年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到如今出版图书20余本，发表文章500余篇，对科研的执着和热爱让田子渝找到了一条矢志不渝的奋斗之路，成就了他作为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终身理想。

两个馒头一瓶水，图书馆里一“泡”就是一整天

少年时期的田子渝，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特别是与湖北相关的历史图书。读中学时，他爱读屈原，感悟楚人精神。陆羽、米芾等在中国思想的天幕上灿烂辉煌的群星，成为田子渝人生的表率。

1965年高考落榜后，田子渝先后到武汉第一师范学校和武汉胜利中学求学、教书。任教期间，他广泛阅读。1974年武汉图书馆开放后，每逢周日放假，他就带着两个馒头、一瓶水，到那里泡一天。

田子渝对武汉历史尤感兴趣。他曾看到一本关于茶叶故事的书，记载18世纪70年代，俄国商人在武汉开办顺丰茶厂、建起武汉第一座近代工厂。依此线索，他到汉口沿江大道车站路口、兰陵路等地调查，写成一篇关于俄商在武汉的茶叶贸易的文章，发表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那篇文章让我获得了20元的稿费，当时我的月薪才30元，于是就请家人和朋友大快朵颐了一番。”田子渝回忆。

1979年，田子渝再次于《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文章《五四运动在武汉》。因兴趣写就的这两篇文章，后来成了他入职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的‘敲门砖’。1980年，他登上了大学讲台。

“科研的起步是兴趣，兴趣又是科研的不竭动力。”田子渝说，他大半辈子从事科学研究，从未将其作为任务或者工作，始终提醒自己保持初心和单纯的求知欲，不断思考和探索。

“史料是历史的灵魂，必须以第一手资料为主”

1986年，田子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恽代英传》，该书与任武雄、李良明合著撰写，是我国第一本详尽介绍恽代英生平革命活动的专著。

“这是我科学研究的正式开端。”田子渝说。多年来，从对恽代英的研究到对李汉俊、董必武的研究，再到对武汉民国史的研究，对中共党史、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他的研究过程就像一棵树苗，最终长成参天大树。

他早期的代表作《李汉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获得了2001年全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二届党史优秀论文二等奖，这是我国党史界的最高科研奖。他承担了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史”专题，其中，对李汉俊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填补了中共创建人物研究的空白。

查阅大量珍贵史料后，田子渝对武汉地区民国史开展了深入研究，他与人合作撰写的《湖北通史·民国卷》获得湖北社科一等奖，被认为是湖北民国史研究的标志性的成果。他还撰写、编辑了《湖北解放战争史》（合著）、《五卅运动在武汉》等。

在此基础上，2012年田子渝与李良明、蔡丽、徐方平等教授合作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被誉为该领域研究的‘扛鼎之作’，被收入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979年，田子渝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五四运动在武汉》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学术生涯尝到的第一个教训。

这篇文章刊发后，田子渝在《江汉论坛》上读到一篇由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教师合写的另一篇《五四运动在武汉》。田子渝将两篇文章对比后发现，自己的文章多处细节有误，“我当时对史料的调查仅限于武汉图书馆，大部分内容是根据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写成的。而另一篇文章的作者专门组织了一个团队到北京，开展了一年多的调研，他们的史料非常详实。”

此后的科研中，他非常注重一手资料的收集。“我是研究历史的，史料是历史的灵魂，必须以档案、报刊等第一手资料为主。”1999年，他出版了专著《武汉五四运动史》。在后记中，他写道：“近二十年来，我已记不清楚到北京、南京、上海的次数了，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一遍又一遍地阅览，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觅。”

在研究李汉俊烈士的过程中，田子渝将李汉俊的活动放在特定环境里，进行实事求是的观照。他采访烈士生前的战友、亲属，远赴北京、上海和日本等多地寻找史料。从1980年开始关注李汉俊，到1997年写成《李汉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整整用了17年。

多年来，田子渝的足迹遍布海内外，搜集到了散藏在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私人手中的200多部文本。“找到了文本，研究就有了基础，研究水平就能走向全国前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收入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后，田子渝总结道。

自1987年破格升为副教授之后，1992年，田子渝顺利获评教授，后又兼职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等。2014年，68岁的田子渝退休后，又先后成为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编译局宣传普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17年，湖北大学打破常规，返聘他为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寻找史料的过程就像寻找宝藏

2017年春节期间，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梁伟年到田子渝家中拜访，看到房间两面满墙的历史资料，他提议将这些珍贵的史料整理成册。很快，以田子渝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成立，开始着手编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2018年5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出版。选集是从田子渝掌握的200余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著作中，精选92部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广泛传播影响和独特思想价值的文本汇编而成的，按其内容特点分为四编。今年10月14日上午，在湖北大学建校90周年之际，由田子渝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1920-1927）》隆重发布。

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对选集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选集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领域一项具有开创性、基础性、系统性、时代性的重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些早期著作文本就是传播的载体。可以说，《选集》从文本上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心。”田子渝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著作文本的收集、整理与出版，是马藏工程的起点，是“红色四库全书”的开篇，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

“30多年来我们到处搜集。”田子渝说，这套书见证了他多年来为研究党史远赴海内外搜集史料的历程。他到美国3次，搜集了陈公博1924年撰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硕士论文复印件；到斯坦福大学搜集到汉口192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数次到新加坡、日本，以及我国境内和香港、澳门、台湾珍藏民国时期图书较多的城市。搜集过程中，他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找到史料的地方，在扬州某中学的图书馆，他找到了一本大革命时期《武汉评论》纪念列宁专刊。

田子渝说，寻找史料的过程就像寻找宝藏的过程。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每当我们翻开布满灰尘、散发着浓烈气味、已经变得脆黄的报刊时，就激动不已，因为我们是在翻开一部被封存的历史，由于我们的努力，它得以重见天日。其间的艰辛和喜悦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在《李汉俊》一书的后记中，田子渝如是说。

“我原本只有高中文凭，是湖北大学不拘一格录用了我，后又破格聘我为副教授，我也是学校首批报到省里评的二级教授，一路走来，学校对我有恩，我也要尽自己所能做好教学科研。”